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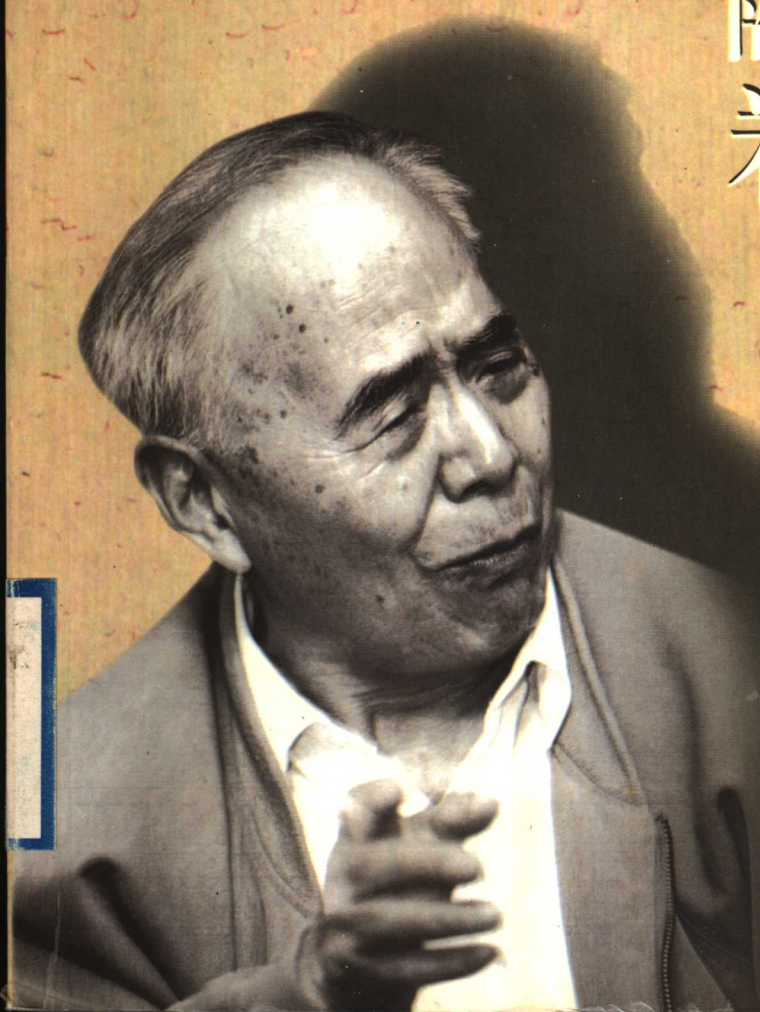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

钱谷融卷

著

钱谷融
殷国明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

钱谷融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钱谷融 著
殷国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 钱谷融卷 / 钱谷融、殷国明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ISBN 7-5059-3311-6

I. 中… II. ①钱… ②殷… III. 文艺思想—中国 IV. I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291 号

书 名	(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钱谷融卷)
作 者	钱谷融 殷国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珊利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保定市华孚商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8.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5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311-6/I.2513
定 价	25.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写在前面

钱谷融

我这个人，是既无能，又懒惰，碌碌一生，无所作为。如果说多少还有些许值得一提之处的话，那就是总算为国家培养了一些有用之材。特别是在新时期以后所带的研究生中，许多人今天已成了国内颇有影响的青年学者了。殷国明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我常说，研究生的培养属于来料加工的性质。成品的价值，多半取决于来料的质地，我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不过由于我的运气好，招进来的都是些可造之材，因此我也就易于向国家有所交待，而自己也可以问心无愧了。

我教了一辈子书，觉得与自己的学生在一起是最愉快的。虽然在极“左”路线统治下，批判我最激烈的也就是自己的学生，但那只是少数，甚至是极个别的，多数还是尊重并理解我的。即便是那些激烈地批判我的人，往往也是迫于时势，并非真的与我为敌。因为，一般说来，学生总是尊重老师的。老师的话总是比较容易接受。而老师，在自己的学生中，也最容易获得知音。刘彦和曾深有感慨地说过：“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学生却几乎个个都是教师的知音，可见当教师该是多么愉快的事！而殷国明与我之间，在心灵上似乎更多相通之处。无论与他谈什么，只需我稍一点到，他就立即明白。尽管我拙于言辞，常常语无伦次，

辞不达意，而从他接着我的话题所展开的论述中，可以见出他所领会到的东西，有时比我自己的理解，还要更为透彻，更为深广，不由得常常引起我默默的惊奇与赞叹。

收在这本《对话录》中的个别篇什，先前在刊物上发表时，国明曾拿给我看过，我就觉得我的一些本来极其平凡浅陋的意见，一经他的插话、提问，就面目焕然一新，显出不少亮色来了。他似乎真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不过，这本对话录，取名为《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不免使我感到万分惶恐。前面说过，我是个既无能而又懒惰的人，平日虽很喜欢读书，但目的只是为了自娱，无意做什么学问，根本不配称为学者。但在这本书上，在“学者”前还要加上个“大”字，岂不更要惭愧煞人，使我简直要产生无地可以自容之感。但我明白，学术是天下的公器，美丑妍媸，天下人自有公论，不是可以由哪一个人说了就算的。编者尽管抬举我，把我也列在几位真正的大学者之后，我却决不可能因此就真成为大学者的。把我的东西，掺杂在这本《对话录》中，颇有鱼目混珠之嫌，不免使我感到十分的尴尬、汗颜，但为了不辜负编者的好意，不使国明的劳动成为白费，也就只得颀颜同意了。

1999年6月1日

目 录

序：写在前面	钱谷融 (1)
一 关于无边的人道主义	(1)
二 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之一〉	(28)
三 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之二〉	(41)
四 关于真诚	(71)
五 关于艺术的魅力	(96)
六 关于艺术创作是一种“有情思维”	(122)
七 关于“不可无我”	(149)
八 关于艺术的具体性	(181)
九 关于艺术创作的生命与动力	(218)
十 关于艺术女神与通俗文学	(248)
十一 关于独创与宽容	(273)
十二 关于文学批评	(312)
十三 关于读鲁迅	(346)
十四 再谈关于读鲁迅	(387)
十五 关于曹禺及其创作	(451)
十六 再谈曹禺及其创作	(491)
附录 (一) 论“文学是人学”	钱谷融 (509)
附录 (二) 仁者之风	李子云 (557)

后记：

读《桥》有感 殷国明 (563)

一 关于无边的人道主义

云南学者马旷源先生仰慕钱谷融先生的人品学识，从楚雄奔于门下，在上海进修一年。他在《钱谷融先生的“平常心”》中谈到了人道主义：“钱先生是提倡人道主义的，他尝自白：我不讳言我是个人道主义者。而钱先生的人道主义又是无处不在的，他不仅仅写在文章里，而且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中。当年，他写《论“文学是人学”》，使了一个障眼法，说这个提法是高尔基的。时过境迁，经过查证，高尔基并没有明确说过这句话，这句话的发明权是钱先生的。他开宗明义就说：‘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受到批判之后，他还是说：‘现实主义者对生活抱着积极的态度，把人当作世界的主人来看待，当作社会关系的总和来理解。他是用一种尊重的、同情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文学既然是以人为对象（即使写的是动物，是自然界，也必是人化了的动物，人化了的自然界），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了人性，不特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的基

础。’（《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这些话均写于乍暖还寒的1957年，其后，先生遭到了漫长的批判，充当急先锋的，是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然而，这批判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幕，莫过于近日被杀的一位女作家，当年她曾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为题，代表在读的大学生们，‘怒斥’乃师的‘谬论’。但时过境迁，当新时期到来之际，也还是这位当年的造反者，却第一个率先举起了人道主义的大旗，以其力作《人啊，人》轰动了文坛，也轰动了中国。这事，我没有敢向先生核实，但我相信，以先生一贯博大的胸怀，对于这种转变和回归，必然是欣慰的。”看来，要理解和把握钱谷融先生的思想理论，就得首先理解和把握人道主义这个核心和基础。其意义不仅在于钱先生几十年来一贯坚持人道主义，是当代文学史上最著名、也是最坚定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理论家之一，而且在于人道主义自身在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思想发展的坎坷命运和重要地位。

殷国明 钱先生，您最近在谈到当代文学创作时强调，一个伟大作家，首先要有一颗博大的心，并且再一次提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人道主义思想的意义。这能不能说这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拥有这种博大心灵的基础？

钱谷融先生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发端是以人道主义为其核心观念的。我们可以“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为证来充分证明这一点。比如，鲁迅的小说和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等，就是十分鲜明的例子。无怪乎茅盾就曾说过：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

目标；郁达夫则以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鲁迅也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弹指七十年过去了，但我们现在是否就能以为人道主义文学在中国已经成熟发展了呢？只要了解中国现当代的历次文学论争，就不难回答这一问题。

殷国明 但是人道主义是一个很宽泛的观念，很难确定它的内涵，很多人甚至认为它是一种保守的观念。

钱谷融先生 对此，我想说的是，所谓人道主义文学观，既强调对人的普遍关心和爱心，也强调人本身的个性意识。它既是一种理论观点，也是一种文学精神，但不管是一种观点还是一种精神，它都试图将文学的存在与人类的生活感受和心灵活动联系起来，强调人的存在及其情感对于文学的根本制约作用，把文学看作是人的存在的一种表现方式，并追求一种文学与人的合二而一的崇高境界。我认为这是文学永恒的基本所在。如果从中国的整体文化方面来考察，那么，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还鲜明地具有一种革命意义，这就是它突出的现代启蒙性质。这是“五四”中国文学传统在当代的继续和发扬，同时，对于各种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还相当浓厚的中国社会文化领域，人道主义文学在当代无疑扮演了一个革命的角色。在这种意义上，更没有理由说它是保守的。

殷国明 我记得这也是《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一种基本思想。

钱谷融先生 没错。不过当时主要是围绕着作家世界观问题

展开的。我的观点是世界观在作家创作中的作用很大，它与创作方法并不矛盾。显然，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这当然与作家的思想、与作家的世界观有关。但所谓世界观，是人的各种观点的总和，它本身是既统一而又有矛盾的。在对待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并不是全部世界观中的每一种观点都起着同等的作用，而是有主从轻重之分的。在文学领域内，既然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那么，作家的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了。

殷国明 对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讨论，现在看来，当时主要强调世界观的作用，实际上是，要在指导思想_上划归统一，解决“立场”问题，结果必然是作家评论家思想独立性的丧失。

钱谷融先生 也许在回顾文学史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当时首先考虑到的是文学的生命力。因为我所接触到的许多大师都无不尊重人，他们的作品中无不闪烁着人性和人道主义光彩。比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如何解释他们作品所显示出的伟大艺术力量呢？光从阶级立场出发，不仅说不清楚，而且会自相矛盾，而过去，都是根据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认为是他们的先进的创作方法突破了他们的落后的世界观，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是这种解释总不能十分令人信服。因为，这等于是说，创作方法和世界观是可以割裂的了；等于是说，一个作家对现实的理解明明是这样，但他却可以把它写成那样，而且还仍然可以是好作品，仍然可以收到影响人、教育人的效果。这即使就常识上来说，也是很难说得过

去的。有一些人就抓住了恩格斯的这一说法，极力宣扬他们否定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决定作用的那套理论。另一些人则从作家的主观思想与作品的客观思想之间的矛盾来说明这一问题，但这仍然是说不通的。因为，作家的主观思想与作品的客观思想之间，尽管确乎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主要也只是深度和广度方面的互有差别，而决不会是属于全然抵触的性质。因此又有一些人企图从这两位作家的世界观的本身找寻说明。他们引证了大量的材料，来证明这两个人的世界观内部原就存在着矛盾，其中既有反动的成分，也有进步的成分；并且断定，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其进步的一面。于是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创作方法是和他们的世界观完全一致的。但这依然缺乏具体的分析。究竟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有哪些是属于进步的因素？又有哪些是属于反动的因素？又是根据什么理由来断定他们的世界观主要是进步的呢？狭义的世界观主要是指哲学观点而言，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是很难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哲学观点说作是进步的观点的。

殷国明 用进步与反动来判定一个人的世界观，尤其是一个伟大作家的世界观，似乎也太简单了，甚至有一种危险性，因为这岂不是意味着可以一下子就把一个作家推到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地位吗？我看还不如首先考察一下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比如是否忠实于生活。

钱谷融先生 这当然比在世界观上下断语好多了，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就拿托尔斯泰的创作来说，假如我们把这原因归结于托尔斯泰对生活的忠实，归结于生活真实的客观力量，就很难说明：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是那么地忠实于现实，而且往

往能从生活现实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托尔斯泰，在他的论文（哲学的和文学的）中却常常会歪曲生活，常常会从生活中得出错误的结论来呢？难道托尔斯泰只有当他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才是忠实于生活的吗？而且，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在托尔斯泰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并不只是存在于他的作品中，在他的思想中也是存在的。那么，可见得这里的问题，就并不是托尔斯泰为什么能有这样一些先进思想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这些先进思想能在他的作品中起主导作用，而另一些反动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却只能退居于次要的地位的问题了；而是为什么这两种思想的比重在作品中比之在思想里会起了个相反的变化的问题了。用忠实于生活这样的理由，是不能说明这一问题的。

殷国明 看来是这样。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用一种思想教条解释一切，总会给人一种机械的感觉，这时候文学作品好像也成了说明某种思想教条的工具了，如果符合了，那就是“充分说明”某公式教条的正确性，如果不符合，那就是作家作品的“局限性”，这种文学批评总给人一种过于褊狭的感觉。

钱谷融先生 当然，我们说过，真正的艺术家决不把他的人物当做工具，当做傀儡，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当成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有着一定的思想感情、有着独立的个性的人来看待的。他一定是充分尊重这个人的个性的，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是非爱憎之感来描写这个人物；他可以在他的描写中表示他对这个人物的赞扬或是贬责，肯定或是否定；正像在生活中，他可以通过自己对一个人的评价来介绍这个人一样。但他决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的人物身上去，强使他的人物来屈从自

己的意志。在生活中是如此，在作品中也是如此。所以，这里，重要的倒是在于作家对于人物的态度，在于作家对于人物的评价。作家对于他的人物的性格是不是够尊重的？作家对于他的人物所作的评价是不是公允的、正确的？假使作家并不尊重他笔下的人物，假使对他的人物作出了错误的评价，也就不会有所谓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了。而对人物的态度问题、评价问题，就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问题，不如说是作家的美学理想问题、人道主义问题了。所以，我们与其把托尔斯泰之所以由原来的想贬责安娜，终于变成同情安娜，赞扬安娜，说成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倒不如把它当做人道主义的胜利来得更恰当些，更容易理解些。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怎么能对安娜这样的女子，对安娜这样的遭遇，不深深地寄予同情而反加以贬责呢？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是托尔斯泰对不幸的安娜的人道主义的同情，战胜了他对妇女问题上和家庭问题上的反动思想的。

殷国明 在这个问题上，我记得您还提到过巴尔扎克。

钱谷融先生 是，巴尔扎克虽然出身平民，却钦慕着贵族，却要在他的姓氏前加一个“德”（de）字。在政治上，他更是一个保皇党，他的同情是完全在贵族一方面的。然而，他在他的作品里，却以“最尖刻的讽刺”、“最辛辣的嘲弄”来对付他所同情的阶级；而带着“不可掩饰的赞赏”去描述他政治上的死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那就是因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巴尔扎克，决不能用别一种态度对待他笔下的人物。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他所同情的，寄以希望的；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来说，是他所仇恨的，坚决反对的。然而，

他在他的作品里所描写的、所评论的，却既不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也不是作为一种政治主张的共和主义，而是一些具体的人和他的具体的行动。他就是根据这些人的具体的行动来确定对待他们的态度，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的。他嘲笑了应该嘲笑的人，赞扬了应该赞扬的人，而我们也因此喜爱他的作品，因此尊敬他为伟大的作家。

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个人的例子，充分向我们证明：在文艺创作中，一切都是以具体的感性的形式出现的，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的。抽象空洞的信念，笼统一般的原则，在这里没有它们的用武之地。因此，在《人间喜剧》中，保皇党的巴尔扎克，天主教徒的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让位于人道主义者的巴尔扎克。同样，在《战争与和平》中，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也是充满了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同情的托尔斯泰，而那“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的托尔斯泰，就只能留下一个淡淡的影子了。

殷国明 您如此推崇人道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您是否当时就考虑到自己过分推崇了人道主义，过高估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用了呢？

钱谷融先生 我是认真考虑过的，但是我坚持相信，如果是就文艺而论，那么，人道主义精神的作用，恐怕还要远比我上面所说的大得多。因为我们看到，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

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假如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概念，并不是在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的评价上都是适用的话，那么，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却是永远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篇古典文学作品上的。也许人道主义精神只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但最低标准却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而且是任何人都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运用着的。够不上最低标准，就是不及格，就是坏作品。达到了最低标准，就应该基本上肯定它是一篇好作品，就一定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再说，谁能够从古典文学作品中，举出一篇，不管是属于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的，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来呢？但是，我们却可以举出很多既不是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的，也并没有什么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来。像过去我们的文艺界所争论的李后主的词，就是属于这一类。要在李后主的词中去找什么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很困难的，除非我们把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无限制地加以扩大。但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是取消了这两个概念的实际作用，对我们只有坏处而不会有任何好处。

殷国明 关键问题在于，人们在李后主的诗词中，找不到文学的一些基本“规律”和“原则”，诸如阶级性、爱国主义等等，他所写的都是他非常个人化的思想情结，比如个人的哀愁、感伤等等。

钱谷融先生 如果评价一切作品都要用阶级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标准，那么李后主的词，王维、孟浩然以及许多别的诗人的许多诗篇，就都只能被排除在古典作品之外。这样，不但会大大削弱我们的文学宝库，而且，还是违反人民的

爱好，违反人民的感情的。人民可能并不懂得什么叫阶级性，什么叫现实主义，但是他们却都有一定的欣赏和鉴别文学作品的的能力。他们的惟一的标准（往往也是最可靠的标准），就是看作品是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的；是不是尊重人、同情人，是不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的。一句话，是不是合于人道主义的原则的？虽然他们也不一定懂得什么叫人道主义。

殷国明 这样，您不是就难免会遭到许许多多的责难吗？比如，您是不是想用人道主义的原则来抹煞、推翻人民性原则和现实主义原则呢？您这种说法，是不是一种超阶级的文学观、一种近乎人性论的文学论呢？是不是等于否认了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的说法呢？

钱谷融先生 对此，我当时料想到了，而且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为了回答这些可能发生的责难，我在文章中作了如下的声明与辩解：第一，如我上面所说，我决不是否认人民性原则和现实主义原则的重大意义，我只是认为这两个原则不能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根本的和普遍适用的原则。我也并不认为人道主义原则就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惟一可靠的、充分有效的标准，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标准。至于说到人道主义与人民性、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那么，我认为它们决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第二，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必然是同情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而痛恨压迫者和剥削者的，他必然会站在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一面来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所以，人道主义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和抽象的人性论倒是格格不入的。第三，文学既是人们的